

# 瑪格麗特·富勒在 1844

——“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

楊 靖

---

[提 要] 1844 年對瑪格麗特·富勒而言意義非凡。這一年她先後完成《湖上夏日》和《19 世紀婦女》，可謂創作頗豐；但與此同時，《日晷》的停刊和“談話”課堂的關張又令她倍加傷感。慘痛的現實迫使她對超驗主義的局限性進行反思。這一年秋，她應紐約《論壇報》之邀，出任該報記者兼文學編輯。一改之前康科德作家群以自我為中心的寫作風格，富勒將目光轉向社會問題，實現了“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離開波士頓前往紐約，不僅是富勒人生的轉捩點，也是超驗主義運動的轉捩點——它標誌著在內戰前夕，面對廢奴運動高漲的局面，超驗主義內部以愛默生和梭羅為代表的文學派，以及以里普利和布朗森為代表的社會改造派，至此形成合流，超驗主義也“由最初鬆散的聯盟一變而為步調一致的運動”。

[關鍵詞] 瑪格麗特·富勒 超驗主義 自我 公共良知

[中圖分類號] I1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52-13

---

1844 年對富勒 (Margaret Fuller) 而言“意義非同一般”。<sup>①</sup>這一年她的首部著作《湖上夏日》出版，在同類遊記作品中別開生面，贏得評論界一片喝彩。同時，她的另一部作品《偉大的訴訟》（後定名為《19 世紀婦女》）也基本完稿（1845 年 1 月出版）。此外，她還有若干評論、書評、詩歌在報刊發表，可謂創作頗豐。但在其他方面，收穫卻不盡如人意。這一年早些時候，她在波士頓舉辦長達五年的“談話”課堂黯然收場：一方面由於她個人的身體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參加的人數不足，她的收入由此大受影響——自 1835 年父親去世之後，家庭經濟壓力一直令她備受困擾，終身不得解脫。緊接著，她苦心經營數年的超驗主義刊物《日晷》雜誌也宣告停刊——儘管兩年之前她以健康為由辭去主編一職（由愛默生接任），但她內心清楚，與愛默生的辦刊理念不合，以及長期辛勞而分文未得，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與事業受挫相比，感情方面的挫折令她更為沮喪。富勒與富家子塞繆爾·沃德 (Samuel Ward) 交往多年，時常在書信中互訴衷腸，結果沃德和她的閨蜜安娜·巴克 (Anna Barker) 小姐秘密訂婚，

---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項目號：17BWW052）的階段性成果。

並於 1840 年結婚。富勒為此鬱悶不已，直到遇見德裔猶太商人詹姆士·內森 (James Nathan)——後者由於家族生意返回德國之後，這一段戀情也無疾而終。令富勒更為糾結的還是她與愛默生之間的關係：這位“康科德聖人”對她的好感有目共睹，可是無論如何富勒也無法再前進一步。她當年 6 月的一則日記最能表達出這種落寞情懷：“我需要幫助。我需要一個充滿愛意的、大大的擁抱。”<sup>②</sup>此前一個月，她的妹妹愛倫生女 (取名瑪格麗特·富勒·錢寧)；其他幾位好友如卡羅琳·斯特吉斯 (Caroline Sturgis) 等也紛紛結婚生子，而她卻似乎註定要孑然一身，孤獨終老。

這一年，與富勒一道經歷巨變的還有她的康科德友人。愛默生《隨筆集》第二卷出版，志得意滿 (富勒的書評不無微詞，更顯二人分歧)。梭羅正為出版《康科德和梅里馬克河上一周》四處奔走，最終為自費出版該書背負巨額債務。奧爾科特 (Bronson Alcott) 創辦的烏托邦“果園農莊”由於經營不善在年初宣佈破產倒閉。里普利 (George Ripley) 的“布魯克農莊”即將由個人互助聯盟轉變為烏托邦性質的“法朗吉” (Phalanx)，在崇尚個人自由的超驗主義者富勒看來，這無疑是不祥之兆。三年之後，一場大火將農莊斥鉅資興建的主樓焚毀，里普利被迫變賣家產清償債務。

隨著“改革與擴張”的口號深入人心，富勒的新老朋友也紛紛投入到社會改造的洪流之中。3 月，她的老朋友克拉克 (James Freeman Clarke) 在康科德學會發表演講，反對兼併德克薩斯，並通過《西部信使報》宣傳進步思想。另一位老友帕克 (Theodore Parker) 同情底層民眾，呼籲廢除奴隸制，主張激進的社會改革。布朗森 (Orestes Brownson) 則在《布朗森季評》雜誌上發表長文抨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傳勞工至上，成為“勞工的先知”，<sup>③</sup>被譽為“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sup>④</sup>富勒的新朋友、紐約《論壇報》的掌門人格里利 (Horace Greeley) 也熱衷於各種社會改造計劃，並試圖通過報刊雜誌“打造公共輿論”並“提升美國人的審美和道德水準”<sup>⑤</sup>——這一年年末，他誠邀富勒加盟紐約《論壇報》，出任記者兼文學編輯。

富勒善於交友。<sup>⑥</sup>好友亨利·錢寧 (William Henry Channing) 形容她談興正濃時往往會“瞳孔收縮，兩眼放光，似乎具有某種天然的魔力”。<sup>⑦</sup>愛默生也宣稱“富勒天才過人，熱情似火，吸引不同性格的人走到一起，是 (超驗俱樂部) 真正的中心”。<sup>⑧</sup>另一位超驗主義代表人物皮博迪小姐 (Elizabeth Peabody) 兩年前接手《日晷》的出版發行，她位於波士頓的外文書店也是富勒“談話”課堂舉辦的場所，這裡一度是超驗主義運動的中心地帶。如今，伴隨著“談話”的結束和《日晷》的關張，皮博迪發現連書店的生意也日漸慘澹——1844 年離開波士頓去紐約，不僅是富勒人生的轉捩點，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超驗主義運動的轉捩點。<sup>⑨</sup>

## 一

1840 年，應愛默生等人之邀，富勒答應出任《日晷》主編，其實也有她自己的考慮。作為 19 世紀的知識女性，儘管她天資聰穎，又勤奮自勵，但卻未能像同時代的男性那樣接受正規教育 (超驗俱樂部早期成員大多哈佛神學院出身)，這也成為她終身難言的隱痛。當愛默生提出他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撰寫《隨筆集》，故而不能如約出任主編時，富勒幾乎不假思索地應承下來——如此一來，既能為她本人提供一個發表的平台，又能借機結識康科德及波士頓一班文人名士。

其實早在 1836 年“赫奇的俱樂部” (即超驗主義俱樂部) 成員最初在坎布里奇集會之時，就提出創辦一份自己的雜誌的構想；因為在當時的新英格蘭，即使最為開明的基督教雜誌也難以接受他們的宗教觀念和激進思想；而另一些內容淺顯的婦女雜誌和感傷文學雜誌又不合他們的胃口。1839 年，當波士頓大眾雜誌向愛默生等人約稿時，為了不被同化，愛默生、里普利、富勒、奧爾科特

等人決定創辦“超驗主義的喉舌”《日晷》，其名稱寓意著一種全新的生活狀態和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sup>⑩</sup>

1840年7月，《日晷》第一期面世。卷首是愛默生的“告讀者書”：“在新英格蘭，舊的宗教習俗和教育傳統將人固化為石頭”，<sup>⑪</sup>一派死氣沉沉，沒有文學天才，也沒有批評家，“讓人看不到希望，讓年輕人失去了夢想”。<sup>⑫</sup>他主張喚醒一群思想上的反叛者，以嶄新的文學樣式來反映時代精神，通過嚴肅而審慎的文藝批評來提高文學的品位，以高雅的詩歌來克服庸常的生活，進而達到完滿的道德精神。“僵化的形式——任何形式，都可能意味著精神的死亡”。<sup>⑬</sup>而他宣導的思想變革，正是對社會習俗的反撥和對保守勢力的抵抗。根據他的超驗主義學說，欲改造社會，必先改善人自身。

儘管編者宣稱這是一本“文學、哲學與宗教”雜誌，但文學性似乎稍稍遜色。遠在英國的卡萊爾收到愛默生寄贈的第一卷後，一方面稱這些來自美國的最年輕的聲音純潔而精妙，令人振奮；另一方面又不無遺憾地指出：文章思辨性、理論性太強，“不接地氣”(ethereal)，<sup>⑭</sup>令人難以接受。

與來自國外溫和的批評相比，國內同行和讀者的批評口吻要嚴厲得多，尤其是針對奧爾科特的“俄爾甫斯箴言”，玄之又玄，晦澀難解，其風格有如“十五節沉重的車廂拖拽著一位旅客”，<sup>⑮</sup>單調而乏味。對於這些批評，愛默生顯示出他執著而堅定的一面：他堅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奧爾科特屬於天才人物，其思想的卓越不凡之處儘管受其文字拖累，卻不能被完全抹殺掩蓋。不顧富勒等人的反對，愛默生對“箴言”進行大幅刪改，並且堅持在隨後幾期中繼續刊發。

富勒和奧爾科特也是好友，曾在“神廟學校”共事。她對奧爾科特的雄辯口才推崇不已，但對他過於雕琢華麗的寫作風格卻不太欣賞。她幾次拒絕由愛默生寄送的修改稿，對完全脫離市場和讀者的雜誌的前途深表擔心。同樣受挫的還有愛默生的“門徒”梭羅。這位剛從哈佛畢業的年輕人雄心勃勃，立志當一名作家，但他描寫康科德地區自然景物的散文卻因為缺乏統一的主題遭到富勒拒絕。<sup>⑯</sup>在《日晷》第一卷中，她只選用了梭羅的一首短詩《同情》和一篇評論《佩爾西爾斯》。

困擾富勒(以及愛默生)的最大問題是稿件匱乏。里普利牧師文筆雄健，可惜他很快專注於經營“布魯克農莊”，無心應約撰稿；帕克投身於社會改造運動，四處奔波；布朗森為自己創辦的雜誌一年撰稿多達十五萬字，也無暇他顧。不得已，富勒只能向外地老友克拉克和赫奇(Frederic Henry Hedge)等人懇求賜稿(愛默生後來則被迫毛遂自薦，選擇刊發其家族成員的作品來填充版面)。<sup>⑰</sup>

當然，這份被稱為“年輕美國的無畏《聖經》”的文學雜誌在第一卷中也不乏佳作，如富勒關於里希特(Paul Richter)和赫德爾(Johann Gottfried Herder)哲學思想的評論，以及阿爾斯頓(Washington Allston)的原創性作品。關於歐洲大陸的文學思潮，一般雜誌更多介紹性文章，至於深入的研究和評論，則是《日晷》的獨特貢獻。在這方面，作為編輯的愛默生和富勒意見高度一致。

儘管如此，在編輯方針方面，愛默生和富勒卻各有側重。除了文學，富勒對音樂、美術、建築、雕塑等藝術樣式也饒有興趣；愛默生則相反，他自稱為“音盲”，美術也一竅不通。羅馬典雅的建築在他眼裡跟波士頓沒什麼兩樣。他重視的是自然與科學。前者在他看來是心靈的外化，與人類情感道德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對應；後者則是人類經驗和智慧的總結。此外，他更注重雜誌的資訊交流功能：國外的某一種文藝理論，國內的某一種學術批評，甚至某人關於社會改革的演講，都能在雜誌上獲得一席之地。他邀請梭羅擔任助理編輯，兩人還一道推出旨在介紹世界上主要宗教學說的經文節選：《道德經典》，內容包括佛教、印度教、波斯教及中國儒家的思想。這也反映出愛默生一貫的主張：古老的經典中往往蘊含著最新的思想。

三個月後，《日晷》第二卷出版。雖然撰稿人沒有什麼變化，但文字風格大有改進。一貫挑剔

的卡萊爾宣稱對這一卷的喜歡程度明顯超過第一卷。尤其是愛默生本人名為《新詩藝》的文學論文，被稱為“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一篇”。在論文中，愛默生宣導“一種受到激發的心靈的即興創作”<sup>⑧</sup>；詩歌應當自心底自然流淌而非源自外部市場。對於藝術家而言，真誠勝過詞藻，內容重於形式。真正的天才如渾金璞玉，形式上未必盡善盡美，但惟其質樸率真，才更具心靈的震撼力。

自《日晷》創辦以來的近兩年中，由於富勒的不懈努力，雜誌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梭羅的風格趨於凝練深邃；霍桑的隨筆可讀性很強；帕克的宗教和神學論文篇幅較長，但氣度恢弘，堪稱雜誌的脊梁。同時富勒還進一步拓寬稿源，增加話題的覆蓋面。但市場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繼任的愛默生像富勒一樣盡心盡職：作為一流的撰稿人，他本人在雜誌上發表的詩文品質上乘；作為負責的編輯，他刪改天才詩人維里（Jones Very）的詩作；挖掘出梭羅的潛質；並將奧爾科特從凌亂冗長手稿中拯救出來。但當超驗主義學說影響消退，當廉價的傷感小說成為市民閱讀的主流，當廢奴運動和男女平權運動日益成為時代最強音之時，這份以自我教化和培養高雅趣旨為己任的文學雜誌前景也就日益黯淡。到 1844 年 4 月，訂戶只剩下區區兩百人，雜誌終於被迫宣告停刊。

作為一個文學刊物，富勒深知《日晷》的失敗主要在於它脫離大眾，只為少數文化精英服務。但與此同時，《日晷》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發表 42 位作者的總共 350 篇作品。這是超驗主義運動保存完好的一部檔案：其中既有作者已湮沒無聞的平庸之作，也不乏愛默生的《新詩藝》、梭羅《馬薩諸塞自然史》以及富勒《偉大的訴訟》這樣的名篇。這也是它在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

如果說《日晷》的成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談話”課堂則由富勒本人獨力打造，因此後者的終結更令她黯然神傷。“談話”由皮博迪小姐的“共讀會”（Reading parties）發展而來。參加的對象大多是富勒的好友和以前的學生，還有超驗主義代表人物的家人，以及波士頓富商家的太太小姐。“談話”課堂設在皮博迪小姐位於西街（West Street）的“超驗主義書店”的前廳。按照富勒的理念，“談話”課堂的目的不僅要使婦女學會社交，更要教育她們，通過改變她們的思維方式進而改變她們的生活方式。除了讓她們獲得“系統化的思想交流”，<sup>⑨</sup>還要學會將這種思想施之於生活的實踐。

“談話”課堂由富勒最為擅長的希臘神話開始，漸次延展到人文學科其他領域，內容涉及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婚姻、家庭、生育等等。除了富勒本人的講座，奧爾科特等友人偶爾也會加入討論<sup>⑩</sup>通過這樣一種成人教育的方式，正如奧爾科特描繪的那樣，“良好的會話極具抒情色彩：各種聲響紛然雜陳，在所有心靈中激起跳蕩的音符，它促使每個人展現自己最好的部分，甚至超過他自己的想像。仿佛被幕後看不見的手所推動，在管風琴上演奏，卻不知合奏的那一部分屬於自己”。<sup>⑪</sup>愛默生也很欣賞這樣的談話方法，認為這是他的“思想的人”（Man Thinking）一種具體體現：通過會話引起思想的碰撞，從而獲得對事物深邃的洞察。“談話”課堂興辦之初，參加人數眾多，富勒每年淨收入可得五百美元，極大緩解了她的經濟壓力。然而，隨著新英格蘭社會的變遷，知識女性紛紛投身於禁酒廢奴、普及教育、男女平權等社會改造運動，年輕小姐則相繼結婚生子，到 1844 年 4 月，學員僅剩十餘人。富勒本人一方面長期飽受疾病困擾，亟需放鬆療養，一方面也打算繼續自己的文學追求，於是決定停辦課堂，專注於《湖上夏日》的撰寫和《歌德談話錄》的翻譯。

《湖上夏日》是富勒與友人結伴西行的記錄，形式鬆散，但文采斐然，引起紐約著名出版人格里利的注意。格里利收購的紐約《論壇報》面臨同行競爭的壓力，試圖通過改版吸引讀者，打開市場銷路；同時，他又是一位富於情懷的報人，希望借助報刊媒體提高民眾道德修養和審美情趣，普及民眾教育。格里利的夫人曾參加過“談話”課堂，格里利本人和富勒一樣也是“布魯克農莊”的常客。

1847年農莊解體後，里普利和德懷特(John Sullivan Dwight)等人也先後被他延攬加入《論壇報》。1844年秋，他向富勒正式發出邀請。

## 二

格里利開出的條件非常誘人：不僅薪酬豐厚(每週三篇專欄文章，年薪五百美金)，而且順帶解決了富勒在紐約的住宿問題；<sup>22</sup>更重要的是，《論壇報》擁有五萬訂戶(後來增至三十萬)，讀者群則不下數十萬人，正是富勒長久期待的平台；另外，格里利保證，她將享有充分的新聞採訪和排版自由。面對紐約的巨大誘惑，身處坎布里奇的富勒並未立即應允，而是再三沉吟。

富勒的顧慮來自康科德。愛默生聞聽富勒即將加盟《論壇報》，已通過書信明確表示反對。<sup>23</sup>報刊文章在他看來不是純文學，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不具備恒久的生命力，將天才浪費在這樣乏味的、應景的寫作上，顯然並非明智之舉。自1839年經熱心的皮博迪小姐介紹與愛默生相識之後，富勒憑藉超群的智力和才華贏得了愛默生的敬重，而她本人對這位大作家更是無比敬仰，由坎布里奇至康科德半日往返的便捷車程使得二人的聯繫更為頻繁。<sup>24</sup>近幾年來，她已不知不覺將康科德視為精神故鄉，與梭羅、霍桑以及奧爾科特等人也結下了深厚友誼。接受格里利的邀請意味著切斷與波士頓-康科德文學圈的聯繫，她內心難以割捨。

但促使她離開的力量似乎更為強大。她的弟弟哈佛畢業投身一家律師事務所，可是沾染上纨绔子弟的毛病，一年僅穿著花銷便需一百五十美元，入不敷出。另一位智力殘障的弟弟和幾個妹妹全要依賴她扶持。她早先在奧爾科特“神廟學校”做助手兼做教師，最終分文未得，只好遠赴報酬優渥的普羅維登斯“格林街”學校，繁重的教學任務嚴重損毀了她的健康。擔任《日晷》主編兩年間，由於刊物銷路不暢，之前商妥的每年二百美元編輯酬勞也無法兌現。她對里普利“布魯克農莊”生產勞動與文化教育相結合的生活方式極有興趣，但加盟農莊首先需要至少五百美元股金，令她望而卻步。作為“超驗俱樂部”的一員，她對他們樂觀豁達的生活理念極為認同，但對他們的凌空虛蹈、不切實際又未免產生懷疑。<sup>25</sup>

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愛默生的行為方式。愛默生的樂善好施遠近聞名：他為長期經濟困窘的奧爾科特一家源源不斷地提供經濟援助(包括資助奧爾科特赴英國考察)，為梭羅提供食宿和就業機會，並為作家霍桑、詩人埃勒里·錢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等提供低廉租房，對到訪康科德的富勒等友人更是熱情相待，但在這背後，富勒卻發現他孤高冷傲、難以親近的一面。“他缺乏溫暖”，富勒在致友人書信中抱怨說，“而且難於捉摸”。<sup>26</sup>文如其人，日後富勒在評價《隨筆集》第二卷時也指出“作者過分專注於自我，缺乏感動人心的真誠”。<sup>27</sup>對於曾經付出的這一段情感，富勒在致愛默生的一封書信中曾不無傷感地喟歎：“我不是僭越者……假如我誤踩了邊線，一定會退出，將果園歸還給合法的主人。”<sup>28</sup>在赴紐約之前的告別信中，富勒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你追求學術，我追求生活。”<sup>29</sup>批評家將這一論斷認為是富勒擺脫愛默生文人團體的影響而“走向心智成熟”<sup>30</sup>的表現。

促使富勒將目光轉向紐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她的名篇《偉大的訴訟》在《日晷》刊載後，反響強烈，但也不乏批評之聲。霍桑夫人索菲亞便質疑一位未婚女子，如何能勘破婚姻的奧秘。<sup>31</sup>更多的批評文章認為作者的筆力似乎僅限於中產白人婦女，視野過於狹隘，未免以偏概全。雄心勃勃的富勒在友人建議下打算將它擴展為一部著作——更多的創作素材，更廣的社會層面，更為龐大的閱讀群體，顯然沒有比紐約和《論壇報》更好的平台。<sup>32</sup>

富勒在《論壇報》發表的文章大體可分三類：注重文學審美的作家作品翻譯介紹，從政治社會學入手的嚴肅的文藝批評，以及一些短訊和時評。她最為擅長的當然是文學理論和批評。在富勒眼中，批評者應該同時具備哲學家 and 觀察家的特徵。文學批評的用處並不單單是為作品“貼標籤”，而是通過鑒賞評判，“過濾”出好的作品。<sup>33</sup>批評家的角色應該是“發現作品中真實的、本質的能量”，<sup>34</sup>並將它傳達給讀者。和愛默生一樣，富勒宣導一種新型的美利堅文學。她認為文學樣式必須隨特定的歷史語境和地理環境而更新——工商業的發展以及蒸汽船、鐵路、電報等科學發明不僅造就了期刊的黃金時代，也拓寬了文學的範圍——她將這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稱之為“歷史羅曼司”，相當於歐洲人的史詩。用她的話說，“小說就是今日的民謠 (ballad)。通過它瞭解我們的時代”。<sup>35</sup>由此，她高度評價霍桑的《故事重述》，讚揚梅爾維爾的海洋小說，以及科克蘭 (Joseph Kirkland) 的邊疆小說。其實早在 1843 年，在致友人克拉克信中，富勒便將美國作家比喻成在大河邊勞作的農夫：歷史的長河流逝，大浪淘沙，沖積出一片新的土壤，作家應當像農夫一樣善於從這片嶄新的土壤中汲取養分，從而創作出屬於這個特定年代的史詩。<sup>36</sup>

富勒文學批評的對象包括愛默生、坡、彌爾頓、勃朗寧等，後收入《文藝論文集》。她書評涉及的對象還包括歐仁·蘇、喬治·桑以及巴爾扎克等法國作家。<sup>37</sup>她批評好友愛默生“單句和段落過於出彩，如馬賽克或助章牆，令人眼花繚亂”，<sup>38</sup>並由此沖淡主題。富勒評價霍桑語言“懶散”、風格“蒼白無力”——“他總是在暗示，卻沒能揭示我們存在的神秘”。<sup>39</sup>但同時也讚揚作家在《古屋青苔》、《胎記》、《拉帕奇尼的女兒》、《天路》、《好小夥布朗》等小說中對人性的刻畫——“霍桑細緻而無畏地探究人性的奧秘”，<sup>40</sup>堪稱“當今最好的作家”。<sup>41</sup>不同於霍桑對女性作家的偏見，富勒對“亂塗亂畫的女人”抱有相當同情，但對無病呻吟的“客廳詩人”卻毫不留情。<sup>42</sup>在她看來，布萊恩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歐文和庫珀不過是歐洲文學拙劣的摹仿者，洛威爾和朗費羅也乏善可陳。她批評名詩人洛威爾“漠視人物內心情感動機，看不到人物性格的發展”。<sup>43</sup>當時新英格蘭最負盛名的詩人朗費羅，在她眼中也是名過其實，他被指控“剽竊”：他的詩是“精妙的模仿……內心缺乏激情，亦無視外在風景”，<sup>44</sup>甚至連意象也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意象是人行道邊躍入眼簾的一朵鮮花，自然而富有詩意”。<sup>45</sup>總之，從內容到形式，毫無創新可言。作為批評家，富勒一向秉持公正立場，對外國作家也不例外。她評價巴爾扎克“思想膚淺”，但同時又讚揚他技藝高超，是“無情的外科醫生”，<sup>46</sup>《高老頭》臨死一章令人心痛欲碎，堪稱“巴黎的李爾王”。<sup>47</sup>相比“富於感召力”<sup>48</sup>的喬治·桑，歐仁·蘇儘管“筆觸細膩大膽”，<sup>49</sup>但缺乏想像力，其創作才情遠低於桑。<sup>50</sup>一言以蔽之，富勒認為偉大的批評家比偉大的詩人更難得，因為批評家必須具備“綜合批評能力”<sup>51</sup>，要用“更高尚的觀點”同美國新近出現的商業主義和膚淺庸俗的物質主義展開對決。<sup>52</sup>從這個意義上說，“富勒自始至終是一位批評家，滑稽的是時至今日，人們記得她是女性主義者，卻忘記她是一位批評家”。<sup>53</sup>

離開康科德之後，富勒逐步遠離自我中心的愛默生，投身於社會改造。<sup>54</sup>身處紐約，她對勞動婦女和窮人的悲慘境遇感同身受。她在報社附近目睹市民捐資興建教堂，而四周流離失所的窮人卻無人問津；她為愛爾蘭移民遭受的不公待遇大聲疾呼；<sup>55</sup>好友亨利·錢寧成立“紐約監獄協會”，她於 1844 年在錢寧陪同下走訪“星星” (Sing Sing) 女子監獄，此後她的文章也多由文學評論轉向政治文化和社會揭露。<sup>56</sup>除了女犯，她關注的對象還包括流落街頭或生活在救濟院的城市貧民——她在文章中痛斥富人居高臨下的態度，並強調樂善好施對社會進步的重要意義。在演講中她宣稱“這是一個嚴峻的社會現實”，<sup>57</sup>而社會理應肩負有責任，幫助不幸之人。此外，她還參觀了貝爾維 (Bellevu) 貧民院、民工子弟學校、瘋人院、感化院和布萊克維爾島 (Blackwell's Island) 監獄等場所。

在慈善醫院，她注意到“哺乳的母親和新生兒一道暴露在男性訪客肆無忌憚的目光之下”，<sup>③</sup>由此呼籲保護個人隱私。在情況更為糟糕的瘋人院，人滿為患（須擴建一倍才夠），“病人蜷縮在牆角，對陌生人無動於衷，心裡沒有希望，眼裡也沒有期盼的光芒”。<sup>④</sup>布萊克維爾島監獄專門關押刑事犯，其中有 700 名女犯。富勒留意到在獄中女教官卻寥寥無幾；除了懲罰，也沒有其他讓人悔過自新的機會和途徑。在她看來，只有根據犯罪的性質將犯人分類，進行教化和改造，才能實現自尊和身心健康。<sup>⑤</sup>她本人熱心為女犯開設道德文化講座，幾乎每週造訪一座監獄或濟貧院。<sup>⑥</sup>富勒認為，貧困是對美國這個“充滿機遇的國度最大的嘲諷”<sup>⑦</sup>——紐約富人聚居在以華盛頓廣場為中心的中城區，窮人則居於下東區，涇渭分明，老死不相往來。而“紐約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有足夠善良的意願，有足夠的管理智慧”<sup>⑧</sup>來解決貧困問題，因此應對公共管理和慈善機構進行改造，使其轉型為民生服務機構。然而，在政黨分肥體制之下，無論民主黨還是輝格黨，對此都無暇顧及。於是富勒呼籲紐約市民：針對社會不公的現象，人們不能視而不見，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而上述文章，亦堪稱 20 世紀美國新聞界“扒糞”運動之先聲。照富勒的看法：“濟貧院、瘋人院、監獄……這些都不是問題，體制才是問題。”<sup>⑨</sup>但與激進派主張不同的是，富勒反對通過暴力革命變更社會制度，而寧願訴諸基督教的福音——一個人人平等、相親相愛的社會才是千禧福音。關注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並為之大聲疾呼，富勒本人也由此完成“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sup>⑩</sup>的轉變。

眾所周知，富勒由文學批評轉向社會評論很大程度上受到紐約“青年美國運動”的影響。<sup>⑪</sup>“青年美國運動”提出自由貿易、社會改革等主張，引起富勒強烈共鳴。<sup>⑫</sup>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出版家戴金克（Evert Augustus Duyckinck）和《民主評論》主編奧沙利文（John L.O’ Sullivan）——後者於 1845 年提出“顯然天命”一說，鼓吹美國的領土擴張，其成員則包括詩人布萊恩特、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以及梅爾維爾、霍桑等人。富勒與之保持聯繫，但反對其大國沙文主義和孤立主義。<sup>⑬</sup>富勒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完全隔絕外來文化的影響，與其故步自封，不如“與時俱進”（synchronicity）。<sup>⑭</sup>

1846 年 8 月，富勒作為慈善家斯普林（Marcus Spring）夫婦十二歲兒子的私人教師，與他們一家一起遊歷歐洲（格里利預支 125 美金，要求她發回旅行見聞）。在英法等國，除了與華茲華斯、卡萊爾、喬治·桑等名流晤面，她將更多的時間用於參觀曼切斯特和利物浦的機械學院、紐卡斯卡的煤礦、設菲爾德的鋼鐵工廠，以及巴黎和里昂的織布廠。對她而言，歐洲像健康而強壯的滋補營養品，“假如我早十年，……我就不會將自己荒廢在根本不適合我天性的土地上”。<sup>⑮</sup>歐洲的種種社會弊端（social ills）也促使她反省美國由財富不平等造成的社會危機（social crisis）——她報導在里昂舉辦的女子室內音樂會，其場景令她聯想到紐約“星星”女子監獄的犯人；在格拉斯哥目睹貧窮婦女流落街頭，其境況則令她聯想起但丁的《神曲·地獄篇》。<sup>⑯</sup>

富勒對奴隸制深惡痛絕，不止一次公開抨擊贊同奴隸制的政客。<sup>⑰</sup>她為 1844 年 1 月麻省的廢奴集會而大聲歡呼，隨後又在《論壇報》撰文高度評價愛默生最近的廢奴演講。她從羅馬發回的報導將義大利人民的自由解放同美國的廢奴運動相提並論——“奴隸制的罪惡造成了美國社會虛假的繁榮，政客們利慾薰心，不惜為此悍然發動戰爭，高尚的道德情感甚至在個人身上也已被遺忘”。<sup>⑱</sup>而身在歐洲的富勒，卻致力於做一名時代的見證者。“這些值得銘刻的事情在我眼前呈現，假如我無法投身革命，我會很樂意成為它的歷史學家”。<sup>⑲</sup>

富勒相信新聞“是我們文學中最重要的部分”，<sup>⑳</sup>它既有修辭力量，又有政治良知，它是“教育民眾最有效的工具”。<sup>㉑</sup>她在“美國文學”一文中寫道：報紙不僅提供“新聞”，更能“傳播知識，並能播

撒思想的種子”。<sup>77</sup>從 1844 年底接手文學版塊，到 1846 年夏遠赴歐洲考察，她共發文 250 篇，其中有文學批評，更多是社會觀察與評論——比如針對紐約市政當局負責聾啞人培訓機構的年度報告所作的評論（要求為聾啞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權）。<sup>78</sup>這些專欄文章和書評社論不僅拓展了文學的疆域，更喚起民眾對社會改造各項事業的關注和瞭解，有助於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也有助於踐行美國民主。富勒深知她與愛默生的區別：文學家追求美，而記者要求真。她所從事的是“偉大的民眾教育”<sup>79</sup>《論壇報》由此成為“偉大的道德工具”，<sup>80</sup>富勒則被譽為“紐約的公共良知”。<sup>81</sup>

### 三

在 1830~1850 大約 20 年左右的時間裡，以里普利、愛默生為首的“超驗俱樂部”成員時常聚會，高談闊論。他們自稱“同好者俱樂部”，<sup>82</sup>而事實上，正如其代表人物之一克拉克所說，“沒有任何兩個想法相似”。<sup>83</sup>另一位代表人物赫奇乾脆否認：“根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俱樂部，只是男女同好者不定期的聚會。”<sup>84</sup>他們相互爭論，相互包容，“唯一不受歡迎的訪客是不寬容(intolerance)”。<sup>85</sup>

通過演講和佈道（大多數超驗主義者是牧師出身），通過書評和專欄，他們試圖傳佈新思想，打造獨具特色的“美國”文化。《日晷》上曾刊登記者薩克森(J.A.Saxton)的文章，他定義“超驗主義宣導的平等與博愛是美國無可爭議的立國之本”。<sup>86</sup>另一位早期超驗主義重要人物巴托爾(Cyrus Bartol)則說，“超驗主義是一艘嶄新的航船，比五月花號更好——藉此真理得以逃脫敵手”。<sup>87</sup>

愛默生在 1840 年寫道：這一場革命影響深遠，儘管其時代精神對每個人意義可能不同：對某些人，它意味著國家某方面的社會改革，對另一些人，它意味著個人的道德提升，以及養成良好的商業習慣，再對其他一些人，則可能意味著拓寬文學藝術的視野、深化哲學的洞見，以及個人在孤寂之中虔誠的祈禱。但無論哪一種，都是對陳規舊習的一種反抗，是一種政治姿態。<sup>88</sup>同一年，他的朋友克拉克也認為，“我預感到整個社會裡都有某種珍貴的東西在醞釀，在發酵”。<sup>89</sup>——用愛默生的話說，“每個人在他的上衣口袋裡都揣著一份改革計劃”。<sup>90</sup>而富勒關於種族、性別和階級的政論文，堪稱改革計劃的總綱。

歐洲的浪漫主義是一場逃離規範、傳統與習俗的運動。傳播到美國之後，在美利堅嶄新的土地上，浪漫主義學說號召人們將社會陳規陋習全部拋棄，奉行徹底的個人主義和對自我的追尋。浪漫主義者大聲質問，在美利堅這樣一個年輕的國度裡，人們為何要受到社會習俗的約束？為何不能大膽探索：嘗試新思想、創造新藝術？由此美國化的浪漫主義得以誕生——它不是歐洲大陸陳舊思想的翻版，相反它是新大陸文化與自然土壤結合而成的新生命。<sup>91</sup>這個新生命被稱為超驗主義。換言之，超驗主義就是“美國的浪漫主義”。<sup>92</sup>

源於激進的歐洲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超驗主義對習俗的挑戰令許多人感到驚愕，超驗主義不免時常淪為嘲諷的對象。狄更斯曾犀利地抨擊：“一切難以索解的東西都是超驗。”<sup>93</sup>卡萊爾在會見里普利牧師後將這位唯一神教的牧師定義為“試圖通過培植洋蔥來改造世界的人”。<sup>94</sup>大家都承認他們心存善良，但又公認他們“不切實際(never pay cash)”。<sup>95</sup>保守的唯一神教牧師鮑文(Francis Bowen)稱它“教義晦澀——雖經喬裝打扮，根源卻仍在外國……是美國人盲目效仿歐洲的病態產物”。<sup>96</sup>超驗主義者用詞典雅，看上去不免裝腔作勢。他們的哲學與其說出於信仰，不如說是矯飾(more a manner than a creed)，“他們最拿手的行文方式，便是故意將文風弄得晦澀難懂”。<sup>97</sup>

儘管如此，超驗主義對美國文化思想的啟蒙(seminal)意義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超驗主義歷史學家弗洛辛厄姆(Octavius Brooks Frothingham)簡明地總結道：“儘管這一運動持續時間較短，規



模有限,參與者數量也較少,但它在思想史上卻意義非凡。”<sup>98</sup>它以充滿活力的開放性姿態,對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和偏狹性(*insularity*)提出了挑戰。

時至今日,多數人認同超驗主義是以愛默生、梭羅和富勒為代表的一場 19 世紀的思想運動。它源於愛默生在哈佛神學院演講中呼籲的個人良知,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生活實踐,富勒的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但人們還應該瞭解:這一運動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這一群體是美國最早的知識份子群體,包括教育改革的推動者,為婦女、勞工、城市貧民甚至罪犯代言的社會改革家,以及廢奴運動的激進派。超驗主義內部可以根據趣旨不同分為兩派:一派以愛默生為代表,宣導自省自立和自我教化,強調文學文化修養對塑造國民性的作用;另一派以里普利和布朗森等人為代表,他們受歐洲社會思想影響,強調平等和博愛。<sup>99</sup>前者的超驗個人主義通常被稱為自我中心主義,後者則將目光轉向經濟制度和社會變革,一方面強調個人價值,另一方面突出眾生平等,二者奇妙地統一在超驗主義內部,自始至終。對應上述兩派,到 1840 年代之前,超驗主義一直存在兩個中心:一是康科德列克星敦的愛默生私宅;一是波士頓的教堂和報告廳等公共場所。<sup>100</sup>19 世紀中期前後,隨著廢奴運動高漲和美國內戰臨近,愛默生派的自我主義者也開始將目光轉向嚴峻的社會現實——從書齋走向公共講壇,並將思想學說付諸行動。此時,超驗主義早期的宗教紛爭早已偃旗息鼓,讓位於新時代波瀾壯闊的社會改革運動;超驗主義激進派奧爾科特和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衝入波士頓聯邦法院,企圖解救廢奴領袖彭斯(Anthony Burns);帕克鼓吹武裝堪薩斯州的“自由土地”(Free Soil)運動分子,與政府抗爭;里普利熱衷“堂吉訶德式”的傅立葉主義;愛默生頌揚起義失敗被送上絞架的布朗(John Brown);梭羅則宣導公民不服從……可見,照米勒(Perry Miller)的說法,“超驗主義的兩極——社團主義和愛默生的個人主義”至此已合二為一。<sup>101</sup>

米勒曾定義超驗主義是“人類精神對情感饑餓的抗議”。<sup>102</sup>這一特定的反抗群體在 1840 年代前後不約而同遭到主流社會放逐。<sup>103</sup>奧爾柯特神廟學校關張,他成為“伊甸逐客”,被迫舉家搬遷康科德,靠親友接濟過活;愛默生辭去家族世襲的波士頓第二教堂牧師之職,成為無業人士,並因神學院演講觸怒教會正統派,近三十年不復入哈佛講壇;里普利也因為教會內部紛爭憤而辭去教職,靠賣文度日。這一群“憤怒的年輕人”,正如帕靈頓(Vernon Louis Parrington)所說,“他們急於改正社會弊端……他們的社會批判雖然嚴厲,但出於真誠,富於理智,這正是美國社會最需要的批判”。<sup>104</sup>

1848 年後,歐洲由“革命年代”轉入“資本年代”。<sup>105</sup>照奧爾柯特的說法,“極端者變得不那麼極端;保守者也認同緩步變革”。<sup>106</sup>美國社會由此進入調適期。一個由黃金、鐵路和貿易支撐的國度變得目空一切,因此更需要超驗主義的批判精神。然而,新一代超驗主義者如希金森,桑伯恩(Franklin Benjamin Sanborn)等人卻以飽滿激情擁抱新時代——桑伯恩宣稱“梭羅的哲學不名一文”(not worth a straw)<sup>107</sup>——事實上,他們更樂於奉行維多利亞時代的主流價值觀,通過自我教化,成為受人尊敬的紳士或道德楷模。

1850 年代以後,昔日超驗主義者搖身一變皆為社會成功人士。赫奇當上哈佛教授,德懷特化身波士頓音樂教父,里普利成為美國文藝批評界的“頭面人物”(Dean)<sup>108</sup>——他們都失去了批判的動力,而當年那些紛爭和激進之辭如今已翻成惡夢,恨不能早日與之決絕了斷。唯一的激進派布朗森贊同馬克思學說——“世界並非由意識決定”——為此不惜與昔日戰友一刀兩斷,成為馬恩信徒;但很快又蛻變為反廢奴主義者,成為保守派。<sup>109</sup>

包括富勒在內的超驗主義者以超強的個人主義著稱,但他們並非游離於歷史之外,相反,作為時代的親歷者,他們緊扣時代脈搏——1830 年代新英格蘭城鎮工業化革命和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

經濟危機共同造就一個劇變的時代，超驗主義由此也應運而生。1850 年代中期以後，除了風起雲湧的廢奴運動和女權運動，美國社會對移民潮，城市化運動和反官僚主義等問題更為關注，而以自我教化為核心的社會改造思想與內戰前後美國社會趨勢明顯格格不入，超驗主義逐步走向式微。超驗主義本以激烈的反資本主義姿態橫空出世，<sup>⑩</sup>至此則一無所用，基督福音派、無政府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等社會團體紛紛解體，足見超驗主義及其他激進派改革方案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儘管如此，它們的出現卻促使有識之士不斷反思，從而也促進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一場關乎人性的思想運動，超驗主義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sup>⑪</sup>

1844 年富勒由康科德至紐約，是超驗主義者邁出的堅實一步，也是超驗主義運動轉向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標誌著超驗主義“由最初鬆散的聯盟一變而為步調一致的運動”。<sup>⑫</sup>

---

①② Susan Belasco, “‘The animating influences of Discord’: Margaret Fuller in 1844”, in *Legacy*, Volume 20, Number 1&2, 2003, p.76, p.80.

③ Barbara L. Packer, *The Transcendentalists*,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52.

④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Orestes Brownson: An American Marxist before Marx”, in *Sewanee Review*, 3 (1939), p.317.

⑤ Robert C. Williams, *Horace Greeley: Champion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1.

⑥ 友人曾戲稱富勒為“教友”，意指其交遊廣泛。Laurie James, *Men, Women, and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 Golden Heritage Press, Inc., 1990, p.255. 還有人形容富勒炫友，宛如炫耀“頸下閃亮的鑽石項鏈”。See Paula Blanchard, *Margaret Fuller: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Revolution*, New York: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7, p.100.

⑦ Laura Saltz, “Magnetism of a Photograph: Daguerreotypy and Margaret Fuller's Conception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Volume 56, Number 2, 2010, p.122.

⑧⑨⑤⑥③⑧⑩ David M. Robinson,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cendentalism”,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Volume 52, Number 4, 2006, p.272, p.271, p.277, p.291, p.287.

⑩⑮⑱⑲⑵④ John Matteson, *The Live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2, p. 169, p.177, p.157, p.116, p.162.

⑪⑫⑬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Editors to the Reader”, in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s: Essential Writings*, Lawrence Buell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6, p.384, p.384, p. 386.

⑭ Charles Crowe, *George Ripley: Transcendentalist and Utopian Socialis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67, p.89.

⑮ 梭羅拒絕修改投稿；另一位被拒稿的詩人錢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一怒之下將詩稿焚毀。See John Matteson, *The Lives of Margaret Fuller*, p.176.

⑯ 愛默生選用的家人手稿包括亡妻愛倫和兄弟愛德華的詩篇，以及另一位兄弟查爾斯的《一位學者筆記的注釋》；此外，他的姑母瑪麗·穆迪·愛默生以及查爾斯未婚妻伊莉莎白·霍爾的作品也陸續刊出。有評論家不無嘲諷地將《日晷》稱為“愛默生的家庭相冊”，顯然沒能體會到主編的苦衷。See John Matteson, *The Lives of Margaret Fuller*, pp.171- 176.

⑰ Ralph Waldo Emerson, “Verses of the Portfolio”, in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s: Essential Writings*, Lawrence Buell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6, p.388.

⑱ See Joan Von Mehren, *Minerva and the Muse: A Life of Margaret Full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pp.113- 119.

⑲ Martin Bickman, *Minding American Education: Reclaiming the Tradition of Active Learning*,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3, pp.62- 63.

⑳ 格里利夫婦邀請富勒與之合住——1840 年代，年輕女子獨居被認為“有失體面”。See Susan Cheever,

*American Bloomsb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6, p.55.

㉓愛默生諷刺富勒去“傻得冒泡的報紙”就職，幾近瘋狂。See 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6.

㉔波士頓至康科德交通工具原本為公共馬車，耗時4小時，資費75美分。1844年鐵路運營後，車程縮短為1小時，資費50美分。Philip Mc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 p.106.

㉕富勒對超驗主義局限性的認識受到好友亨利·錢寧的影響。David M. Robinson,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cendentalism”,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Volume 52, Number 4, 2006, pp.275- 280.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Margaret Fuller, *Critic: Writing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1844 - 1846*, Judith Mattson Bean & Joel Myerson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 p.xxvi, p.xxvii, p5, p.454, p.287, p.290, p.63, p.60, p.57, p.62.

㉞Eva Kornfeld, *Margaret Fuller: A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7, p.93.

㉟愛默生曾答應為《19世紀婦女》寫序，後來有所顧慮，婉拒之，令富勒大為不快。See Laurie James, *Men, Women, and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 Golden Heritage Press, Inc., 1990, p.358.

㊱Deborah Manson, “‘The Trance of the Ecstatica’: Margaret Fuller, Animal Magnetism, and the Transcendent Female Body”, in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Volume 25, Number 2, Fall 2006, p.301.

㊲霍桑夫人索菲亞·皮博迪是“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楷模”，對所謂女權運動“絲毫也不感興趣”，對富勒與霍桑的接觸尤為反感。她對《19世紀婦女》的評語是：“富勒若真的結過婚，便不會再為女權而困惑。”Philip Mc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pp.104- 105. See also Adam-Max Tuchinsky, “American Socialism and Margaret Fuller’s 1848”, in *Margaret Fuller and her Circles*, Brigitte Bailey, Kathryn P. Viens, and Conrad Edick Wright, eds., Durham: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13, p.100.

㊳在波士頓，富勒致力於譯介歐洲文學，尤其是德國文學，在《日晷》上發表的多為文藝批評長文。到紐約後，她的目光逐漸轉向種族（非洲黑奴、印第安土著居民）、階級（愛爾蘭勞工、德裔移民）以及性別（婦女地位、女權）等社會問題，在《論壇報》上發表的多為時政短評。此前她只在文人小團體發聲，現在則能夠為公眾代言。See Margaret Fuller, *Critic: Writing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1844- 1846*, pp.xv- xxxiii.

㊴參見程心：《福勒和愛默生：超驗主義的文學關係》，北京：《國外文學》，2012年第2期，第81頁。

㊵Paula Kopacz, “Feminist at the Tribune: Margaret Fuller as Professional Writer”, i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1991, p.130. 近年來有學者考證，富勒關於能量轉移的理論受到當時流行的催眠術影響。See Bruce Mills, *Poe, Fuller, and the Mesmeric Arts: Transition Stat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p.39- 42.

㊶富勒在介紹歐洲作家時通常會大段引用，因為她相信普通美國讀者很少有機會閱讀原著；評價本土作家時則更多引用少量名言雋語，鉤玄提要，這也體現了她作為一流批評家的獨到見解。See Margaret Fuller, *Critic: Writing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1844- 1846* p.xxiv.

㊷Brenda Wineapple, *Hawthor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3, p.194.

㊸Philip Ma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p.122.

㊹See 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p.249.

㊺Margaret Fuller, *Critic: Writing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1844- 1846*, p.39. 富勒對波士頓流行的“高雅文化”一向排斥，認為這是歐洲傳統的產物；這類作品受到權貴贊助，在市場上大行其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而美國文學的對象“只有大眾”。一般人認為19世紀興起的印刷革命“粗俗”，富勒卻為大眾文化吶喊歡呼。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pp.251- 252.

㊻㊼㊽Paula Kopacz, “Feminist at the Tribune: Margaret

Fuller as Professional Writer”, i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p.129, p.126, p.126.

⑪轉引自楊金才：《瑪格麗特·富勒及其女權主義思想》，北京：《國外文學》2007年第1期，第114頁。

⑫參見程心：《福勒和愛默生：超驗主義的文學關係》，北京：《國外文學》2012年第2期，第81頁。

⑬Paula Kopacz, “Feminist at the Tribune: Margaret Fuller as Professional Writer”, i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p.119. 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富勒曾被布朗森譽為“美國超驗主義的女祭司”。See Eva Kornfeld, *Margaret Fuller: A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 p.231. 她預言丁尼生將會繼華茲華斯成為桂冠詩人，卡萊爾的《克倫威爾書信集》將成為一場災難，霍桑將憑藉《胎記》等小說一鳴驚人；作為《論壇報》特約評論員，富勒最早向美國公眾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平等思想和經濟學說學說，並且預言“這是個新時代的來臨”（1844年8月馬恩在巴黎會面，同年馬克思完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pp.249- 262.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Philip F. Gura,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p.226, p.226, p.226, p.226, p.234, p.234, p.234, p.5, p.5., p.5, p.xi, p.xii, p.xii, p.136, p.xiii, p.xiii, p.xiii, p.xiii, p.xiv.

⑳ Philip F. Gura,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History*, p.226. 富勒在專欄文章中善於將社會現實與文學想像融為一爐，具有相當的藝術感染力。如在貝爾維醫院見到荷蘭侏儒女孩，她立刻聯想到“雨果筆下的人物”；在布萊克維爾島監獄目睹那裡的女孩衣衫不整，頭髮凌亂，便又想到歐仁·蘇在《巴黎的秘密》等小說中刻畫的場景，以及托馬斯·胡德的詩歌《歎息之橋》。Margaret Fuller, *Critic: Writing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1844- 1846*, pp.98- 136.

㉑富勒在“歡樂峰”（Mount Pleasant）監獄與女犯交談，獲悉她們大多因貪圖享樂而走向墮落。富勒認為賣淫不單單是中產肌體上的毒瘤，更是彌漫在整個社會的“瘴氣”——對金錢的追求無所不在，通過商業化求婚、結婚的毛細血管滲透到社會各階層。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p.181.

㉒朋友說富勒樂意“幫助每一個相識之人”。富勒曾夜訪棚戶屋，發現那裡的“老鼠四下走動，試圖尋找更好的居處”。她曾走訪貧民區的天花病人，是“唯一一個甘冒被傳染風險”前往探望的女性。她號召為改造女犯的“希望之家”募捐。她要求特赦星星監獄一名女子。她對印第安人的處境深表同情，指控“白人是半開化的海盜”，他們信奉“強權即真理”。她認為紐約中產階級是“新型法利賽人”，必須通過“新福音書”，喚起道德同情心，才能實現“新耶路撒冷”。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pp.203- 205.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Leslie Eckel, “Margaret Fuller’s Conversational Journalism: New York, London, Rome”, in *Arizon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eory*, Volume 63, Number 2, Summer 2007, p.30, p.30, p.31, p.31, p.30, p.30..

㉓“青年美國運動”主張新英格蘭文學才是真正的文學，他們的《文章精華》和《美國著作選》收錄霍桑、梅爾維爾和坡等人的作品，致力於構建美國文學——富勒引為同道，愛默生則譏其為“政治文學”。Charles Capper, *Margaret Fuller: An American Romantic Life (The Public Years)*, p.237.

㉔富勒受歌德影響，宣導“世界文學”，被主流媒體如《民主評論》等視為異端。由於擔心言論過於激進，出版社要求富勒從即將出版的《文藝論文集》中撤除部分容易引發爭議的文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富勒作為文學批評家身後的聲望。See Margaret Fuller, *Critic: Writing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1844- 1846*, p.xix. See also Yonatan Eyal, *The Young American Mov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1826- 186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9.

㉕Francis E. Kearns, “Margaret Fuller a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5, No. 1 (Jan.- Mar., 1964), pp.121- 122.

㉖Robert J. Scholnick, “‘The Ultraism of the Day’: Greene’s Boston Post, Hawthorne, Fuller, Melville, Stowe, and Literary Journalism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American Periodicals*, Vol. 18, No. 2 (2008), p.174.

⑧ Jeffrey Steele, "Purifying America: Purity and Disability in Margaret Fuller's New York Reform Writing",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Volume 52, Number 4, 2006, p.311.

⑨ Margaret Fuller, *Life Without and Life Within or, Reviews, Narratives, Essays, and Poems*, Arthur B. Fuller, ed.,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59, p.99.

⑩ Cyrus Bartol, *Radical Problems*,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72, p.73.

⑪ 羅賓遜 (David M. Robinson) 宣稱, 超驗主義自問世之日起, 天然具有政治維度, 因此“政治的超驗主義”是同義反復。David M. Robinson, "Margaret Fuller, Self-Culture, and Associationism", in *Margaret Fuller and her Circles*, Brigitte Bailey, Katheryn P. Viens, and Conrad Edick Wright, eds., Durham: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13, p.93.

⑫ 參見侯深:《自然與文明的暢想:超驗主義、波士頓與城市時代的園藝》,北京:《北大史學》,2013年第1期。

⑬ 參見 Jennifer J. Baker, "Natural Science and Romanticism",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4(2007); 楊靖:《“浪漫的”科學——論梭羅後期寫作的轉向》,北京:《外國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第82頁。

⑭ Charles Dickens,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Vol. 1)*,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2, p.133.

⑮ Octavius Brooks Frothingham, *Transcendentalism in New England: A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XXV.

⑯ 在哈佛教授諾頓 (Andrews Norton) 與里普利就愛默生演講的無神論傾向發生論戰前, 超驗主義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 此後乃逐步形成統一陣營。自1830年代超驗主義興起至全盛的大約十年間, 里普利是公認的領袖, 1838年後愛默生才開始成為核心人物。See Henry L. Golemba, *George Ripley*,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7, p.47 - 48; Charles Crowe, *George Ripley: Transcendentalist and Utopian Socialist*, p.97.

⑰ Adam - Max Tuchinsky, "American Socialism and Margaret Fuller's 1848", in *Margaret Fuller and her Cir-*

*cles*, Brigitte Bailey, Katheryn P. Viens, and Conrad Edick Wright, eds., Durham: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13, p. 103.

⑱⑲⑳㉑ Bruce A Ronda, *The Fate of Transcendentalism: Secularity, Materiality, and Human Flourishing*,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7, p.11, p.145, p.208, p.208.

㉒ 在時人眼中, 超驗主義者大多行為怪誕, 好高騖遠, 屬於非主流 (ec-centric)。Bruce A Ronda, *The Fate of Transcendentalism: Secularity, Materiality, and Human Flourishing*, p.68.

㉓ 桑伯恩曾是拯救布朗的“秘密六人小組”成員, 1866年, 作為資方發言人, 他斷然否決工人代表八小時工作日的提案。See Anne C. Rose, *Transcenden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1830 - 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8.

㉔ 里普利在《論壇報》的薪酬超格里利, 很快償還因布魯克農莊破產而欠下的巨額債務。他與達納 (Charles Dana) 合編的《美國新百科全書》銷售150萬冊, 版稅高達18萬美元, 在當時是天文數字。Henry L. Golemba, *George Ripley*,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7, pp.112 - 117. See also Charles Crowe, *George Ripley: Transcendentalist and Utopian Socialist*, p.236.

㉕ 布朗森日後改宗天主教, 相信歐洲貴族制遠勝於美國民主制, 並認為廢奴運動對社會秩序造成威脅, 由此與超驗主義徹底分道揚鑣。See Anne C. Rose, *Transcenden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1830- 1850*, p.216.

㉖ 超驗主義反資本主義——人的欲望造就了商業繁榮, 而節欲使人失去動力, 導致社會生產和消費水準停滯不前。See Anne C. Rose, *Transcenden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1830- 1850*, p.124

㉗ Anne C. Rose, *Transcenden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1830- 1850*, p.225.

作者簡介: 楊靖, 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美國文明研究所所長。南京 210046

[責任編輯 桑海]